

我们都是靠抢劫亚洲苦力才得以生存的，我们中间那些“开明的”人都认为这些苦力应该得到解放，但是我们的生活水准，因之也是我们的“开明”，却要求这种抢劫继续下去。

(奥威尔：《鲁德亚德·吉卜林》)

冷战时期，曾让太多人感到绝望，特别是夹处于美、苏之间的欧洲人。比如英国的“愤青”（愤怒的青年）愤什么？就是二次大战的“英雄”还霸占着这个世界（奥斯本：《愤怒的回顾》）。

现在，老一代的“英雄”差不多都已离去。他们留下的遗产是什么？一是战争，二是革命。它们的变奏，构成了《动物农场》的主题。

### 一、必也正名乎？

奥威尔的书，《动物农场》和《一九八四》，共同主题是批判极权主义。什么叫极权主义？我们可以讨论一下。

在西方的政治词汇中，有两组词，黑白分明，最能体现西方的价值观：

#### （一）好词

一) freedom (自由)，和下面的词是同义词。只不过，liberty 是借自法语，freedom 才是英语本身的说法。

二) liberty (自由)，有“解放”之义，我们常说的“解放”，其实就是“自由”。美国的“自由女神”是“解放女神”。法国大革命的口号，“自由、平等、博爱”，其中的“自由”(liberté)就是相当这个词。一般说，摆脱奴役才有自由，自由是解放的结果，但英美革命的继承人却喜欢说，解放是自由的结果——守法即自由，没有规矩的自由是不自由。

三) equality (平等)，主要指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。法国大革命的

口号，其中的“平等”(egalité)就是相当这个词。《礼记·礼运》的“大同”、《墨子·尚同》的“同”，庶几近之。

四) fraternity (博爱)，意思是手足之情、兄弟之情。法国大革命的口号，其中的“博爱”(fraternité)就是相当这个词。孔子弟子子夏说，“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，庶几近之。

五) democracy (民主)，是希腊老词，本义是人民统治。欧洲政体，古典时代是分为三类六种：君主制(monarchy)和僭主制( tyranny)是一人统治，贵族制(aristocracy)和寡头制(oligarchy)是少数统治，共和制(republic)和民主制(democracy)是多数统治。亚里士多德说，这三组词，都是前边好，后边坏：君主制最好，贵族制其次、共和制又其次；民主制是暴民政治，寡头制和僭主制是暴君政治，都不好。可是现代政体，流行的却是民主制。即使君主立宪，也是虚君共和，有没有君主无所谓，关键是不能没有议会。

## (二) 坏词

一) autocracy (独裁)，是从autocrat来的。autocrat是独裁者(auto是自己，crat是统治)。我国帝王，称孤道寡，唯我独尊，西周时期，叫“余一人”，最像这个词。这种一人说了算的统治者，在我国，那是司空见惯，并不都叫暴君。中国的暴君，那得“独”到一意孤行、谁劝都不听、随便杀人、近乎虐待狂的分儿上。如武王伐纣，把纣叫“独夫”，就是这种暴君。

二) dictatorship (独裁)，来源于dictator。dictator，本来是罗马共和国的民选执政官，通常有两名，罗马帝国的皇帝就是从大权独揽的执政官发展而来，后来引申为“独裁者”。卓别林的《大独裁者》(The Great Dictator)，就是用这个词指希特勒。过去，我们常说的“无产阶级专政”，就是“无产阶级独裁”。马、恩和列宁认为，革命胜利后，无产阶级为了镇压敌对势力的反抗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，必须如此。专政是过渡手段，下一段才是社会主义。

三) despotism (专制主义), despot 是暴君。暴君哪儿都有, 没什么新鲜。比如希腊的僭主, 还有某些罗马皇帝 (卡利古拉和尼禄), 就是西人常说的暴君。他们的传统是小国传统, 对暴君很敏感。我国, 秦以后的皇帝, 以武力取天下, 没有贵族出身, 有点像僭主。春秋的赵简子和陈成子, 汉魏的王莽和曹操, 权力很大, 也像僭主, 但我们不叫暴君, 只叫“乱臣贼子”或“乱世奸雄”。

四) absolutism (绝对主义, 或绝对君主制), 学者多把这个词翻成“专制主义”, 如中文版的《不列颠百科全书》就这么翻。我国常说的“专制主义”, 是个没有历史概念的混沌。其实, absolutism 这个词, 和 despotism 还不完全一样, 它是专指资本主义前夜, 高度集权的君主制。这种君主制, 是和等级君主制相对, 是和权力分散的封建制相对。它在欧洲, 兴起和衰亡, 时间不一样, 主要在十六至十九世纪这一段 (俄国拖到一九一七年)。如法国的路易十四、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、俄国的彼得大帝, 都属于这类君主。欧洲各国, 绝对主义越发达, 革命越激烈, 法国和俄国就是如此。absolute 的意思是绝对的。法王路易十四说“朕即国家”, 就是这种绝对主义。最近, 刘北成、龚晓庄翻译了佩里·安德森的《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》(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), 就是介绍这类国家。

五) totalitarianism (极权主义), 是二十世纪才创造的新词。极权概念的发明者是意大利哲学家秦梯利 (Giovanni Gentile, 或译金梯利, 一九四四年被意大利共产党杀掉)。上世纪二十年代, 极权的概念经墨索里尼宣传, 广为人知。这个词是法西斯主义的代名词。total 的意思是全面的或总体的。它强调的是党国至上、集体主义、绝对服从和军事化。totalitarian 是全面控制社会的大独裁者。它的特点是全面控制: 全面控制社会, 全面控制个人, 比传统的专制主义和绝对主义更加专制, 董乐山主张译为“全面权力主义”。汉娜·阿伦特有《极权主义的起源》(一九五一年), 三联书店已经出了译本。

## 二、层层剥笋

上面的好词，全是文艺复兴、启蒙运动和欧洲革命的遗产；坏词，除极权主义晚出，全是前资本主义概念。它们彼此相反，有如尧、舜与桀、纣。

什么是民主？民主是小国传统。世界各大文明，早期都有这一段。

西方人讲民主，老爱搬希腊城邦。其实，希腊的民主自由是建立在侵略和奴役之上。

希腊依山傍海，利于海外贸易，利于海外扩张，玉帛女子，可从外边抢，像骑马民族一样。他们的城邦全是小国，去古未远，古风犹存，还保留民主制。但即使希腊，也有六种政体，不光民主制。古希腊，一堆小国，松散联合，居然打败比他们强大的波斯帝国，很让欧洲人自豪。亚历山大征波斯，横跨欧亚，建立庞大帝国，犹“小邦周克大邑商”，是希腊的顶峰，西人特爱吹，叫“希腊化时期”。但他一死，土崩瓦解。

同样，罗马早期也有民主制。他们摆脱共和，走向帝国，也是顺理成章。罗马帝国，后来居上，更庞大，更发达，但即使走向帝国，也还保留城市自治，国家依然很松散，难以控制各地的反叛和阻挡北方蛮族的入侵。

中世纪南下的蛮族，类似我国的匈奴、鲜卑，本来也很民主。他们的入侵，也是“小邦周克大邑商”。庞大的罗马帝国，让他们一冲，也土崩瓦解。他们的占领，不像我们的西周封建，是归同一个王来领导，更像五胡十六国。今天的欧洲，小国林立，书不同文，车不同轨，就是承受这份遗产。

欧洲，大地域国家不发达，小国寡民的记忆特别深。即便现代大国，也多半是靠海外殖民复制的联合体，很像城邦自治的古典时代。文艺复兴，他们是“爸爸不亲爷爷亲”，宁肯认同希腊、罗马，好像特民主。但他们也热衷过专制，不止一次。

欧洲走出中世纪，一度提倡专制：抬君权，压教权，抬专制，压封

建。十八世纪，他们还羡慕过我们的专制。

当然，这种专制，早已不是什么传统意义上的专制，而是上面说的绝对主义。好听的说法是“开明专制”。绝对君主制取代等级君主制，权力太大，威胁市民社会，引起反弹，才有后来的革命，申民权，抑君权，再掉过头来反专制。

他们是反封建在前，反专制在后，专制是封建的对立面。

欧洲的君主制，上有教权（宗教大一统），下有封建（国家多元化），王是小王，帝非常制。他们的帝，源出罗马，拉丁系的国家叫皇帝（imperator，原义是得胜的将军），日耳曼和斯拉夫系的国家叫恺撒（caesar）。查理曼帝国、神圣罗马帝国和沙俄帝国，是欧洲的三大帝国，帝号多出罗马，一般要由教皇封。法西斯主义源出意大利和德国，这不是偶然。意大利的前身是古罗马，德国的前身是神圣罗马帝国。墨索里尼的“法西斯”（一种插着战斧的笞棒）是复罗马之古，希特勒的“第三帝国”也是继承神圣罗马帝国。他们都是托梦于罗马。罗马是帝制的象征。

西方民主，是专制的对立面。但现代民主，中间隔着中世纪，并不来自希腊。它是欧洲革命的产物（西方有一种说法，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，如果是这样，民主只有六十多岁了）。民主革命的理想是破旧立新，革命的结果是折中新旧。

革命，是个意向纷纭的怪物，民主也是如此。革命，既有王冠落地，也有王权复辟。民主，也是既有英国立宪传统和洛克的影响，也有法国启蒙运动和卢梭的影响。民权挑战君权和教权，结果往往是三权妥协。革命后的欧洲，不但教皇还在，九个国家还保留了王室。

极权主义不是欧洲历史上的专制主义，而是个非常现代的概念。

法西斯主义是一次大战和经济大萧条的产物。当时的欧洲，很不景气，到处弥漫着对民主和进步的绝望，权力意志的鼓吹甚嚣尘上。大家希望，强者出面，收拾乱局，哪怕权力大一点。极权主义是二十世纪的概念，不但和罗马无关，跟中世纪也没什么关系。

极权主义是意大利法西斯的发明，纯属右翼概念，所有左翼都反对。但右翼骂左翼，也用这个词。社会主义好一点，至少可以和民主挂在一起，欧洲左翼政党，很多都是讲社会民主的党，甚至还是执政党。共产主义就不行。他们说，苏联的社会主义和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一样，也是党国至上，暴君加暴民，这样的社会主义是极权主义。

极权主义是典型的西方话语。帝国主义瓜分世界，大局已定，所有国家，站队画线，壁垒分明，维持的叫民主国家，反对的叫极权国家（现在指共产主义）或民族主义国家（现在多以恐怖主义称之）。绝大多数国家，欧美和日本以外的国家，都属于后两类。这种划分很霸道。

可惜的是，奥威尔无法区别于上述话语。对左翼来说，这是难逃的困境。

奥威尔说，他天生憎恨权威，但权威反不掉（参看恩格斯：《论权威》）。暴君对他，是个挥之不去的噩梦。他的噩梦分两种，一种是法西斯主义，一种是斯大林主义。他把两种都叫极权主义。我们只有理解当时的气氛，才能理解他的恐惧。当时的世界太野蛮——反对野蛮的，同样很野蛮。

社会主义苏联和法西斯德国，一左一右，都挑战过世界格局。它们都是帝国主义战争的产物：一次大战，德国战败，备尝屈辱；俄国革命，强敌环伺，也被围困。它们有同样的创伤，同样的困境。贫困和战争，扭曲了这两个国家，二者颇具对称性。可是，问题的根源在哪里？正在格局本身。

凡尔赛和约，埋下二次大战的种子；雅尔塔协议，也是冷战的根源。在这种格局下，苏联的一切都是围绕安全转，对内对外，造成种种问题，很多战略考虑，都被帝国主义化。这是革命的不幸。但只有站在格局的立场你才会说，它和法西斯德国是一家。

我们不要忘记，法西斯德国是最最反共的国家。他们和英、美的矛盾是由“瓜分”而引起，在“反共大业，同仇敌忾”上，他们和英、美是一家。

苏联的卫国战争，写进《动物农场》，叫“风车战役”。我们都还记得，皮尔京顿和弗里德利克是真正的一伙。当弗里德利克悍然攻打动物农场时，皮尔京顿说“活该”，他希望的是，弗里德利克替他消灭动物农场。

奥威尔绝不会同意，弗里德利克和动物农场是同一拨儿。这就像西班牙内战，他虽痛诋左翼，恨其自相残杀，但绝不会分不清左右翼。

他说，“这法西斯主义总得有人制止它”。为了抵抗德国，苏联人民付出了最大牺牲（不光死人，还有制度上的牺牲）。

我们不能把苏联红军和德国法西斯混为一谈，就像我们不能把八路军和日本鬼子混为一谈。

### 三、说“东方专制主义”

西方和东方的对立可以追溯到欧洲的古典时代。笼统的“东方”是由笼统的“西方”制造。“普世价值”是基督教话语。

早在古典时代，欧洲人就有一种说法，希腊人和罗马人是“文明人”，他们的北边，他们的东边，都是“野蛮人”。中世纪，北欧和南欧成为同一个基督教世界，但异教的东方还是属于“野蛮人”的世界。

古典作家说，西方特民主，东方特专制；欧洲人酷爱自由，亚洲人奴性十足。他们说的西方是希腊城邦，东方是波斯帝国。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偏见。

最近，美国拍了“样板戏”，《亚历山大》、《三百壮士》，就是再现这种偏见。亚述、巴比伦（现在的伊拉克）是最伟大的文明。波斯（现在的伊朗）继承了这两个文明，包括他们的地盘。它是一个文明程度很高、行政效率很高的大地域国家，所有考古发现和文献史料都证明，希腊比不了。古典作家嘲笑波斯，正如由余入秦嘲笑秦，自豪的不过是戎狄的蛮风。

换位思考，亚历山大征波斯，其实也是蛮族入侵。欧洲历史，从西到东，从北到南，总是落后征服先进，后来的罗马，后来的日耳曼，都

是如此。

古代东方有很多大国，没错。这些大国很专制，也没错。但很长时间里，欧洲历史学家对这些文明古国，少所见，多所怪，以为只有他们的小国寡民才叫文明，以为只有他们的松散联合才叫文明，这是颠倒黑白。

近代欧洲，他们的地理知识有长进，但文化偏见没有变。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，欧洲历史学家沿袭了古典时代的偏见。他们把西方炮舰所及的整个东方，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到印度的莫卧儿帝国，从古老的波斯到古老的中国，全都装进同一概念。这一概念就是所谓“亚细亚生产方式”。

“亚细亚生产方式”是个十足的历史混沌，它是一堆既模糊又混乱的印象：土地国有制和村社组织，大河灌溉和水利社会，绝对专制和普遍奴隶制，没有法律，没有贵族，还有早熟、停滞等等。

黑格尔使用了这类概念。他把整个东方，叫做“暴政的舞台”。

受黑格尔影响，马克思也使用了这一概念，虽然他更关心的并不是“暴政”。

马克思的“亚细亚生产方式”，正式提出是在《经济学手稿》（一八五七——一八五八）中。但这一概念，在他第一次讲唯物史观的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（一八四五——一八四六）中就已存在。对比二书，我们不难发现，他当年使用的“部落所有制”一词，就是相当这一概念。他把“部落所有制”（相当亚细亚）排在“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”（相当希腊、罗马）、“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”（相当日耳曼）之前。在他眼里，这种形态更古老。所以，他还保留了黑格尔爱用的“儿童”一词——和欧洲相比，我们只是早产的小儿！

今天，我们都已知道，“亚细亚生产方式”是个陈旧过时的概念，既不能概括东方各国的共性，也不能反映东方各国的差异，很多“特点”似是而非；很多“特点”不能成立。这一概念，经过近百年的研究，“日

凿一窍混沌死”，已经寿终正寝。

专制主义只是东方的特点吗？并不是。东方，很多国家，早就是大地域国家。这不能叫野蛮，只能叫文明。更何况，西方大国有专制，东方小国有民主，双方都是既有民主，也有专制。西方民主、东方专制的历史虚构是不能成立的。

我国近代反专制，说我们反对的是“封建专制主义”，这是误用西方的概念。

我的朋友，刘北成先生，他是治欧洲思想史的。上世纪九十年代，他就提出，人家欧洲，“专制”的反面是“封建”，这两个词怎么可以搁一块儿？最近，他再申此论（见他为佩里·安德森《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》写的中译者序言），讲得更清楚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，它要反的是“绝对主义”而不是“专制主义”，更不是“封建主义”。过去，我们把absolutism译为“专制主义”已经不太合适，理解成“封建专制主义”就更加荒唐。

研究中国历史，同期比较很危险。我们要知道，中国和欧洲，从起点上就很不同，它们在时间上有很大错位。

第一，中国从很早就是大地域国家，君主制很发达。早期民主制，很难查考，没有，不必找。要找，只能到蛮荒之地。蛮夷列传诸蕃志，汉族以外的地区倒是有。孟子说，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下》），好像很重视民，但这是“事后诸葛亮”，越大讲“民贵君轻”，越是说明民太轻。现代民主制，不管资本主义代议制，还是社会主义代议制，都是外来。两千多年来，在我们的历史记忆里，中国只有君主制，没有民主制。

第二，中国从很早就是中央集权的大帝国。这种大一统，两千多年不变，每个王朝都是二三百年的连续体，和欧洲对比很强烈。西周时期，我们也有封建，但不同于欧洲封建。朝代和朝代之间，有异族征服，异族多被汉族同化，接受的是汉族制度，也不一样。中国有专制可反，无封建可反。

第三，我国的帝制，从一开始，皇帝就有绝对权力。他把不同宗教、不同语言的众多民族 (ethnic groups) 纳入同一个版图，类似现代的民族国家 (nation)。政教分离，宗教被国家控制，国家大一统，宗教多元化，也类似宗教改革后的欧洲国家。这样的国家，有君权可反，无教权可反。

中国的大一统国家，亚历山大的帝国和罗马帝国没法比，中古时期的帝国也没法比。它更像欧洲历史上的绝对君主制。欧洲绝对主义，高峰是十八世纪。难怪当时，欧洲各国，群拜康、乾为榜样。这段蜜月期，很让国人自豪，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，随着他们崛起，我们衰落，反被他们骂，就连老学生日本都骂（日本的现代化是个例外，它是从封建制直接进入现代国家，欧美特喜欢）。

近代中国是在骂声中长大。别人骂，我们自己也骂。

我还记得，“文革”后，中国的志士仁人痛感中国落后，对“封建专制主义”曾力加挞伐。他们常犯的一个错误，就是把极权主义等同于绝对主义，把绝对主义等同于历史上的暴君，老是分不清古代和现在，放着眼前说天边。当时的大家，真是骂昏了头，明明是眼跟前儿的事，什么都赖秦始皇。现在倒好，自从有了盛世感，康、乾又成香饽饽，大家特别健忘。

长期以来，“专制一锅粥”，“民主一锅粥”，占据了所有人的头脑。特别是，他们对西方的民主神话深信不疑，还以为专制主义是中国特有的传统。

这个酒劲儿应该醒醒了。

#### 四、我为革命说几句话

我们这一代是生活在冷战时期。冷战时期，就是奥威尔讲的“和解”。这种“和解”，其实是和而不解，就像电影中的场面：两人同时拔出枪，冷枪顶着热脑门，谁也不肯放下。

冷战的结局是什么？是同时开枪，同归于尽？还是同时扔掉枪，实现全面和解？是一方扔掉枪，被对方打死或束手就擒？还是拿枪的逼扔

枪的重新捡起，继续玩前面的游戏？

目前我们看到的，不是前两种，而是后两种。

这个时期，现在叫“后冷战时期”。冷战时期是和而不解，后冷战时期是解而不和。后冷战是冷战的延续，我们只是看见个头。

革命正在被遗忘，就像拳击手死后的动物农场，变成荒诞的故事。今天重读奥威尔，我想为革命说几句话。

（一）革命是逼出来的，不是想出来的。

阿伦特说，战争是老词，革命是新概念（《论革命》）。“革命”曾经是个神圣的字眼儿，不仅是二十世纪，也是十七至十九世纪。

回首二十世纪，前后两半，对比很强烈：上一半，世界只发生过两件大事，两次大战逼出两次革命：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，左翼风靡世界，下一半，是冷战改变世界，世界告别革命，右翼卷土重来。

有人说，革命不合法。我很奇怪，革命还有什么合法？

谭嗣同说，“各国变法，无不从流血而成……有之，请自嗣同始”。

（二）战争与革命有不解之缘。

阿伦特说，“迄今为止，战争与革命决定了二十世纪的面貌”（《论革命》）。革命与战争有不解之缘，她说对了。尽管，她关注的是两者都使用暴力，暴力给人类造成太多灾难，让她感受不自由，莫大痛苦（她是德籍犹太人，避祸逃美，思考原点是反犹太主义）。

战争是资本主义的DNA。西方的军事传统，不但有五百年的一贯逻辑，还保留了古典时代的野蛮（穷兵黩武，奴隶比例最高）。这是他们的祖坟。

革命是战争的解毒剂——虽然革命也有毒，它们都沾血带污。

抗日战争，国际国内，各种政治势力在中国斗法，缠绕纠结，纷纷纭纭，绝非书生所能解，但抗日战争成就了中国的革命，这点毫无问题。

（三）要骂革命，先骂战争。

近五百年的西方战争史，绝对是一部罪恶史。原罪可以原到最初的

殖民战争，基本方式不变，基本逻辑不变，特点就是霸道（参看拙作：《读〈剑桥战争史〉》）。

战后的美国，打仗成瘾，不打仗不能活（民主、共和两党都打，所有总统都打，除了越战结束后的卡特）。一九九〇年到现在，这十八年里，美国一口气打过四场战争：海湾战争、科索沃战争、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。不到最后一步，大家想不起越南战争（当年，无论左右，谁都反）。

人类的两次世界大战，很多“文明人”都投票支持过本国的帝国主义战争，就像希腊公民，以为战争是民主的延伸（战争与民主有不解之缘），正像奥威尔说的，“战争即和平”、“自由即奴役”。西方人的傲慢和自私，几乎毁掉了这个世界。

这四次战争，没有一个干净。反战是唯一的正义。

（四）中国革命，前仆后继，反专制是一面大旗。

中国历史，专制主义很发达，梦被西方打破，乃有革命。辛亥革命，推翻清朝，走向共和，是反专制；北伐战争，打倒军阀，统一南北，是反专制；抗战胜利，共产党用武力赶走国民党，是反专制；现在提倡民主化，也是反专制。一切都顺理成章。虽然，反和被反，经常具有对称性，我们的反专制，老是用一种专制反对另一种专制，仿佛交叉感染。这是由残酷的环境所决定。

（五）专制是革命的对立面，但革命也会造成专制。

卢梭的《社会契约论》要特别声明，人民有推翻暴君的权利。欧洲革命后，这样的问题依然存在。因为当时，还有很多复辟活动发生，保守势力也有长期的延续。专制主义，即使在革命成功后，也有很多变种，包括革命的专制主义。

辛亥革命后，中国南北对抗，北方是前清帝制的复辟势力和武夫当国的北洋政府，代表保守势力；南方是国共两党，代表革命势力。由于新旧势力找不到妥协的办法，所有政治势力，全都诉诸武力和强权，被人称为“武化革命”（许倬云）。谁都无法否认，正是因为反专制，不能没

有集权，特别是过渡时期。孙中山看得很清楚，中国革命，不能一步到位。在他看来，起码要分三阶段（军政、训政和宪政），头一段就是专制。马克思讲三阶段，头一段也是专制。

革命也会造成专制，有什么奇怪？法国革命革出一个拿破仑，中国革命也革出一个袁世凯，道理一样。陈伯达写过《窃国大盗袁世凯》。袁世凯是历史上的王莽吗？不是。他和蒋介石一样吗？也不一样。当时，很多政客都想推他出来当皇帝。

拿破仑是个复杂人物，他是个“革命皇帝”——革命革出个皇帝，太讽刺。拿破仑的专制，一般叫“波拿巴主义”，这就是革命的专制主义。当时，“极权主义”的概念还不存在。

革命的专制主义也要反。

（六）革命是为了什么？

西方革命，有个深入人心的概念，革命是为了自由。阿伦特说，自由才是衡量革命的唯一标准（《论革命》）。她说的革命，太干净，一不能沾暴力，二不能沾专制，这样的革命哪儿找？

现在的世界，革命革伤了，革命革怕了。大家都说，英国革命好，美国革命更好，法国革命糟，俄国革命更糟。美国远离欧洲大陆，自然资源，得天独厚，白人畜奴，有人替他们干苦活，独立之后，什么君权教权、阶级矛盾，全都可以绕过去，多好。但这是特例，全世界没有第二家。

阿伦特说，革命不是造反叛乱、以暴易暴，而是秩序的重建：法国革命，无法无天，革命革到不自由，不如美国；美国学英国，光荣革命不流血，先为自由立规矩（与保守势力妥协），所以没有混乱，没有导致新专制。这是先自由，再解放。她甚至从语源上考证，革命的本义就是复辟（《论革命》）。一句话，革命不如不革命，不革命才是真革命。

有趣的是，中国的革命之父孙中山说，中国革命是因为自由太多。庄士敦（溥仪的英国老师）闻之，大惑不解（《紫禁城下的黄昏》）。他为什么

不解？就是因为有上面的定义。

孙中山说的自由，是清室逊位后，中国面临的权力真空和无政府状态。在他看来，没有权威，不能结束这种混乱局面。我国的革命，用阿伦特的标准衡量，肯定最糟。但即使这样的革命，也是追求新秩序。

（七）中国革命是为了救亡图存。

革命，求自由而得专制，是很多人害怕革命、远离革命的原因。但真正的革命和战争类似。没有高度集权（哪怕是由议会授权），就没有战争。没有高度集权，也没有革命。不流血的革命，就像不流血的战争，好是好，就是太少（认真讲，是根本没有）。

权力集中就一定不好吗？答案似乎很肯定。其实，资本主义国家的战时体制，福利国家的计划体制，社会主义国家的镇压敌对势力，不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和权威主义，大部分都与战争和革命有关。它们各自有各自的理由。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环境，把所有的集权都搅成一锅粥，统称为极权主义，特别是等同于法西斯主义。

中国革命，是为了救亡图存（西方统称为“民族主义”，他们的逻辑是，义和团是“民族主义”，八国联军才是“国际主义”）。虽然在欧洲革命的谱系中，这种革命没有位置，流血太多，代价太大，但统而观之，通而观之，仍然很伟大。这不是国共两党哪一个人的功过问题，而是这个民族的功过问题，整个上一代人的功过问题（功过往往在一块儿，人不是蛋糕，没法拿刀切）。

（八）中国革命，不容诋毁。

当年，参加中国革命的人有个共同体会，让他们刻骨铭心：西方列强一向操纵落后国家的政变和内战（今天也如此，特别是美国）。它们支持的都是“弱国中的强者”，认定强者才能代表利益和秩序。这是西方列强的游戏规则。强者经常换，但几乎毫无例外，全是各国的保守势力。

革命的老师并不支持中国革命。

中国革命为什么会“一边倒”，道理很简单：北伐，只有苏联支持；

抗日，最初也只有苏联支持。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一年，长达四年，英、美都在看热闹。

早在抗战胜利前，美国就已看出国民党的腐败（他们考察过延安，有对比）。战后，机会均等，命运的天平更倾向国民党，但国民党兵败如山倒，自己丢了天下，为什么？

一九五〇年，自由主义作家林语堂曾抱怨，“为什么苏俄在亚洲有能干而有效的工具为他们服务，而美国却只有像蒋、李承晚和菲律宾总统这类s.o.b.（狗崽子，son of bitch的缩写）合作？这是本世纪最大的谜团”。

其实，这不是什么谜团。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，“自由世界”的代理人，他们代表的并不是本国的民主，而是强国在海外的利益。从巴蒂斯塔、吴庭艳到本·拉登和萨达姆，向来如此。我们还没有发现过另一种解读。

二十一世纪，时光逆转，历史倒读，好像什么都可以翻案，但中国革命的案不能翻。

中国革命，不管是谁，不管他们的意识形态如何，所有人的愿望有共同指向，一是摆脱列强瓜分，二是结束四分五裂。先解决挨打，再解决挨饿，其他问题慢慢来。

人民英雄纪念碑还巍然耸立在天安门广场。一百年来，所有为中国革命捐躯的烈士（从秋瑾到江姐）永垂不朽！

二〇〇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